

(18)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四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8486

湖南人民出版社

YH260/05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长沙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徐日晖
装帧设计：张小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8,000 印张：7.75 印数：1—3,900
统一书号：11109·198 定价：0.74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 回忆湖南和平解放中的地下斗争 刘寿祺(1)
- 参与湖南和平解放工作的回忆 张立武(33)
- 奉命赴华中局汇报的经过 刘禄铨(43)
- 地下斗争的一个据点——长沙市立补习学校 刘梦华(48)
- 解放战争时期长沙市地下党的斗争 沈立人(56)
- 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始末 刘晴波(82)
- 湖南经世学会和公务员工协会 肖 规(103)
- 回忆醴陵、萍乡黎明前的斗争 孟树德(115)
- 解放战争时期攸县地下党的斗争 彭秀实
尹 辉 贺湘楚 邹乃山(166)
- 岳阳解放前夕的学生运动 陈平凡
万永敦 陈树荣(174)
- 湘中一支队的战斗历程 陈 明(179)
- 参加湘中一支队活动的片断回忆 李伏波(208)
- 坚持敌后斗争的湘中二支队第三团 莫新春(216)
- 湘中第三支队第三团述略 李致中(228)
-
- 补充·订正·质疑
-
- 关于长沙市和平自救运动的补充 陈伯勋(238)

- 关于浏阳县王某被杀的订正 陈新明(239)
订正禹之谟一则史实 成晓军(240)
对《湖南和平起义中的一些情况》的两点更正 李昊(241)
关于抢运交警总队仓库军用物资的质疑 严振世(241)
关于特务搜捕余志宏同志的问题 李文锦(242)

附录

湖南省各县解放时间表

回忆湖南和平解放中的地下斗争

刘寿祺

湖南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了。三十年前的峥嵘岁月，历历如在目前。

湖南和平解放，从孕育到结果，为时将近一年。这是伟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一年，是湖南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同桂系军阀生死搏斗的一年。中共湖南省工委在党中央、毛主席亲切关怀和指引下，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迎大军南下，促义师反戈，陷顽敌于绝路，免古城于浩劫，实现了全省人民的愿望。我是这一伟大革命斗争的参加者之一，在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做了一点实际工作，现就回忆所及将我亲历的一些事情分述如下。

一、从南京回到长沙

一九四八年夏，我从南京回到长沙，接受党的任务，踏上了参与湖南和平解放运动的征途。在此以前，党派我打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呆了两年，社会职业是督学。一九四八年三月下旬，教育部派我处理南岳国立师范学院拒绝康辛元担任院长的纠纷，来到长沙，旋即去会见湖南省委书记周里同志，询问地下党对国师纠纷的意见。他说，国师现在还没有党员，进步力量

也不很多，那里的纠纷是国民党CC派与三青团争夺院长职位，我党并未与闻。我知道这一情况以后，去到南岳，在国师住了二十来天，将纠纷作了初步处理，准备经长沙返回南京向教育部汇报，行前又去见了周里。他说：“你不必去南京了，这里有大量的工作急待开展，需要人。”我说：“我将处理国师的问题向教育部汇报以后，争取早日回湘。”他同意了，并告诉我，他们夫妇打算到乡下去住一个时期。于是，我就送他们住在长沙县霞凝乡我爱人陶蒲生（中共党员）的家里。我到南京以后，地下党交给我在南京的任务已可结束，就赶在这年的夏天，回到长沙。省工委交给我的任务主要是搞统战策反工作，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各方面的联络工作。

二、建立地下联络点

一九四八年夏，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之后，接着又被白崇禧夺去了他的武汉行辕主任。蒋介石为了牵制桂系，任程潜为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主席。七月间，程潜率领一班人马到了长沙。省工委认为蒋介石、白崇禧、程潜之间，有着种种可以利用的矛盾，争取程潜和平起义是可能的。因此决定把党的领导中心移到长沙市内。这就需要有个既合法又秘密的据点，以便联络人员，部署工作。于是，我和余志宏同志商量打算办一所补习学校。当时我是南京政府教育部督学，余是湖大的教师，办补习学校名正言顺，既可掩护，又可联络。我们研究后，报省工委批准，就开始筹备。余志宏托程岑华交给我银元六十元作开办费。一九四九年春，我们在长沙市北门外油铺街租了一栋房子，出了招生广告，招收了学生数十人，都是一些进步青年。先后在补习学校工

作的，有刘梦华、郑小叶、刘向文、陈执中、张学萃、袁家式、傅业葵等同志。先后在这里住过的，有罗正坤、卢其超、胡兆瑞、王蔚琛、涂西畴等同志。学校建立了党支部，胡兆瑞任支部书记。开始由余志宏领导，不久改由我联系。刘梦华一直在学校负实际责任。有了这个小小的据点，既便于市里的同志碰头，又便于外地的同志来长沙接洽工作；由长沙派到外地工作的同志，也常在这里接头。

补习学校在油铺街办了一个时期，为了安全，迁到城南化龙池刘建绪的公馆里。除继续担负党的联络工作外，还成了党内外同志学习的一个场所。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各项工作指示，必须要党内外同志了解的，分别在这里传达和学习。还在这里主办过地下武装干部学习班，由罗正坤、欧阳方两同志主持，参加的有曾汉基、熊松、胡焕球、雷普文、欧阳文德等同志。到解放前夕，这所补习学校——党的联络点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由于我挂了教育部督学的牌子，有公开的社会身份作掩护，所以我的家当时也成了一个重要的据点。在南京时，湖南省工委交给我的任务，主要是做省工委与中共南京办事处和南方局之间的联络工作，回湖南后，省工委仍派我担任一部分联络工作。省内各地党的负责同志来长向省工委汇报请示工作时，为了避免意外，常不能直接去找省工委，也不便直接联系其他同志，便先到我家里来接洽，由我向周里同志汇报，或与他约定时间、地点和暗号，由他亲自或派人接谈。如醴陵县委书记孟树德、岳阳党组织负责人刘向文、吴晓霞等，都是先到我家联系，约定地点时间会见周里同志的。刘向文在白崇禧来长沙时，还在我家隐蔽了十多天。程星龄与周里商谈程潜起义问题也在我家接洽过。南方局派欧阳方来长沙参加省工委工作也是先到我家联系，然后周里

来我家与他见面的。派到陈芸田家里去收听延安广播的黄时美，支援湘中一支队的人员和药品器材，也是经过我家接转的。欧阳方、梁君大等在我家开过几次会，商量策反工作，我爱人陶蒲生也参加了，她母亲带着小孩为我们看门。为了安全，我曾嘱咐陶蒲生，如有人来找我，问我的化名“柳奇”，你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因为我的化名是对过去不认识我的人或者带危险性的地方用的）。如果问我的真名字，你要看他是不是党的联系人，如不是，也不能把我的情况告诉他。即使是平日来联系过的人，也一定要问他找我有什么事，如果他不能说明是什么事，就用暗语问他，否则只一般应酬接待，不要谈什么情况和问题。在这段时间，我们虽处在极端复杂的环境里，但始终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

三、参加争取程潜、陈明仁的工作

省工委从估计湖南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出发，一度把工作重点放在统战策反方面，并就领导和干部的分工作了如下的部署：由余志宏直接与程潜及其身边的重要人员接触；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包括余志宏）负责综合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意见，供领导参考，并向有关同志传达领导意图；最后由省工委负责同志审时度势，决定大计，作出指示。在将近一年的策反过程中，我与余志宏等同志的接触是比较频繁的，在我回长沙之前，周里与余志宏直接联系，大体上是十天半月碰头一次，有时还难做到。我回长沙之后，周里就派我与余作经常的联系，一般问题由我与余商量处理，遇有重要问题，则转报省工委处理。我与余志宏联系时，主要是了解和研究程潜、陈明仁及其所属的思想情况和行动倾向

等问题。

程潜初回湖南时，在欢迎大会上表示积极反共，后来又发表告湖南人民书，也多是诋毁共产党的。余志宏与我商量，对程潜究竟应如何估计，对他的争取工作从何着手？我们认为，程潜这种表示，可能是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给他武器装备，以便搞点实力做资本；也可能他是本来就是一贯反共的，现在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这种表现是很自然的。不管是哪种情况，现在还不可能直接对他做工作，首先要通过他的左右去影响他的思想。余志宏去找马子谷商量，马提出最好把在台湾的程星龄找回来，通过他去做程潜的工作。余向周里作了汇报，周表示同意。于是由余写信给程星龄，托人带到台湾，不久程就回湖南了。程回湖南后，周里要我到小林子冲程的住处去看望他，了解一下他的思想和态度。我去程处和他谈了一些问题，认为他对时局的认识是清楚的，态度是明朗的，如果周能和他面见谈谈，对于他去执行策动程潜起义的任务，是有好处的。我即同周里去看望了程，结果甚为圆满。

在程星龄回湖南之前，湖南地下党就已通过方叔章的关系，对程潜做了一些工作。方是程潜的顾问和老友，与程关系密切，与余志宏及湖大一些进步教授也有接触，受他们的影响，赞成湖南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在地下党的授意下，方在他的家里举行了一次便宴，邀请李达、伍蕙农、余志宏和程潜的亲信幕僚邓介松、肖作霖、程星龄等，座谈时事，由李达作主要发言，他透辟地分析了形势，说明为程潜计，走和平起义的道路是为上策。这次座谈对邓、肖等人有较大的影响，也就间接影响了程潜。

一九四九年春初，程潜宣布撤销“戡乱委员会”，停止征兵，态度显然有所转变。但由于他过去一贯反共，战犯名单上又被名

列第三，思想顾虑仍大。余志宏就这个问题和我商量，我们认为必须通过各种关系，对程说明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决不会算旧帐，傅作义已有榜样。我们通过程的左右同程谈过多次，程的顾虑还未消除，直到党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八条二十四款公布之后，才基本消除顾虑，下定和平起义的决心。

为了争取程潜起义，程星龄、邓介松、唐星、马子谷等作了许多工作，余志宏曾代表省工委两次与程晤谈。事非亲历，我就不再在这里多说了。

一九四九年春季，湖南和平运动一度高涨。四月以后，白崇禧对湖南的控制步步加紧，形势开始逆转。白逼迫程潜改组省政府，将拥护和平运动的秘书长邓介松、民政厅长邓飞黄撤换，以他的亲信杨绩荪，田良骥代之；又把全省保安副司令兼长沙警备区司令肖作霖撵走，以陈明仁兼任警备司令，企图以此控制程潜和湖南政局。五月上旬，白崇禧由武汉窜来长沙，进一步压迫程潜，镇压和平运动，并企图把程弄到广州去。程潜处境十分困难，颇难自保。省工委研究局势，认为要想湖南实现和平解放，必须稳住程潜的地位，乃通过唐星向白崇禧进言：湖南军队很复杂，没有程潜这块牌子，就很难维系，万一发生麻烦，对广西不利，不如把长沙绥署暂迁邵阳，让程潜也去邵阳，万一形势变化，再移芷江，从芷江与广西会合，较为有利。白崇禧接受了唐的这个建议，长沙绥署于六月迁到邵阳，程潜亦于七月二十一日去邵阳。白崇禧送走程潜后，即离开长沙去衡阳。白离长后，长沙的局势马上发生了变化，陈明仁的态度已趋明朗，起义酝酿达到了成熟的阶段。七月下旬省工委派我去邵阳，请程潜速回长沙，与陈明仁商讨通电起义之事。程潜在邵阳是住在陈光中的别墅里，离邵阳城有三、四里路远。我为了能够安全到达程的住处，先由

熊松(安插在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党员)告知邵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宋涛(早与地下党有联系)，再由宋涛通知程潜，说警备司令部有要事派人来与他面谈。我到陈光中家见了程潜，即把藏在眼镜盒内绒布下的省工委密写纸条递给他；并说解放军东路已达平江，西路已过澧县，正向常德进发，省工委特派我来转告颂公，请速回长沙，与陈明仁将军商讨通电起义及其他有关问题。目前白崇禧的部队已从衡阳向邵阳方向开拔，走迟了将受他的控制。邵阳市的情况很复杂，颂公行前切不可使外人知道，就是随去的人员也不必过早知道，更不能让陈光中知道。驻宋家塘的保安团不可靠，路过时要提防。东西不必带，以免引人注意。我转述省工委的意见后，程即表示一定严守秘密，立刻安排回长沙。他们一行于七月二十九日回到长沙。

争取陈明仁起义，是湖南和平解放的一个关键。省工委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余志宏，我只是协助他作了一些工作。我曾同余多次研究陈明仁的情况，认为他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四平街战役中，蒋介石嘉奖了他，但为陈诚所嫉妒，随即又撤了他的职，因而对蒋、陈不满。陈与白崇禧过去并无历史关系，白起用他，不过想要他死守武汉和长沙。蒋介石则想利用他监视白崇禧和程潜。蒋、白、陈之间是有矛盾的。陈明仁与程潜关系则有所不同，陈是程的学生，又是小同乡，他对程一向以长辈尊敬。程潜既下了起义的决心，当可影响陈明仁。但估计做陈的工作要比程潜困难得多。余志宏通过程星龄、肖作霖、邓介松、温沐沫、李君九等对陈做了一些争取工作，他已暗中表示愿意跟程潜走一条道路。但他内心的矛盾是很复杂的，顾虑也是很多的。他来湖南后，始终没有与蒋介石断绝联系，与白崇禧也没有公开对抗过。看来他是准备了两条道路。他多次表示积极反共，可能是借以迷

惑蒋介石、白崇禧，现在解放军即将进逼湘境，不得不跟程潜走一条路，我们必须用一切办法引导他走和平的道路，断绝他走战争的道路。除了通过各种渠道做他本人的工作以外，还要设法争取他下面有实力的人物，并从社会舆论上和军事上造成有利的形势，给他压力，迫使他走和平的道路。省工委经过研究，并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工作重点仍放在争取陈本人方面，主要是通过李君九、温汰沫等人对他做工作。经过一段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陈明仁的顾虑逐步减少，想向和平起义的道路走去。但他还是不大放心，提出要面见湖南地下党负责人。省工委拟派欧阳方与陈会面，欧阳方因陈明仁没有在程潜致党中央的《备忘录》上签字，认为他不可靠，不愿与他会面。省工委乃改派余志宏与陈见面。余在去陈处之前曾向我表示：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当然不考虑个人安危，一定努力去完成它。不过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请你即刻告诉周里同志。我说：这是我的责任，请你放心。但据我的分析，这种可能性不大，一是陈的几个亲信都和你联系多次，陈的思想状况，我们已经了解，他暗中已向我们表示愿意跟程潜走；二是光明与黑暗两条道路摆得很明显，形势逼着他不敢铤而走险；三是程潜已下了决心，对他可以起决定性的影响；四是陈左右的人多数是你的同乡，起义问题对他们有切身利害关系，他们不会出卖你。当然，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你到他家里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从他家里出来后，要特别注意。余说：必须要有陈的亲信同去，我不能单独去见他。我说：这你是有经验的。随后，余就由李君九陪同去见了陈明仁。陈终于和程潜一道起义了。

为了多有几个人来对陈明仁施加影响，我们还曾对陈的同乡好友张严佛进行了争取工作。张严佛是军统的重要头目之一，曾

任军统局主任秘书，西北区区长。因与毛人凤有矛盾，又看到蒋政权行将覆灭，想另找出路。一九四八年程潜竞选副总统时，他曾积极为程奔走。后随程潜回湘，任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主任。他和陈明仁关系颇深。一九四九年二月，程星龄向余志宏提出，想把张拉过来，通过他对陈明仁做些工作并控制军统特务，防止他们破坏起义，保障程潜的安全。这件事，余志宏与我商谈过两次。我当时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争取张是可以的，但要十分慎重。张不是一般的军统人员，要经过考验。没有确实把握时，党内同志不可直接与他接触。余志宏向省工委汇报请示，省工委也是这个意见。后来余和张谈了一次话，交给他几项任务，张都答应尽力去做，实际上也做了。张和陈明仁接触较多，对陈有一定的影响。当陈在程潜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因程指名要他发言表态不满而跑回醴陵时，张曾和李君九一道赶赴醴陵劝说陈返回长沙。长沙解放前夕，除了毛人凤直接指挥的一些特务，如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健钧等以外，凡是张所能控制的特务，都没有干破坏起义、危害人民的事，个别的甚至参与了起义活动。张还把一份潜伏特务的名单交给我地下党，对我们在解放后肃清残余特务分子有很大的帮助。

在湖南和平解放的整个过程中，推动程潜、陈明仁起义，使湖南人民免于战祸，余志宏在地下党省工委的领导下，始终站在第一线，忠诚、勇敢地与程、陈及其左右频繁接触，作了许多工作，对湖南的和平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则只是了解一些情况，帮助分析一些问题，提供一些意见，给他和周里同志参考而已。

四、参加争取唐生智、李觉的工作

唐生智系军政界耆宿，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北伐战争，同蒋介石一直有矛盾。抗战结束后，投闲置散，隐居在东安老家。一九四八年冬，唐到上海，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并同我党发生了联系。一九四九年二月，唐返回东安，政治态度愈益倾向中共。其时蒋介石已下台，李宗仁代总统，撕下和平假面具，不接受中共提出的八条二十四款，白崇禧企图在湘桂两省负隅顽抗。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起义尚在酝酿中。省工委为了使和平运动迅速高涨起来，想请唐出来，组织一批社会进步力量，促使程、陈下定走和平解放道路的决心。先是由程星龄、马子谷委托李觉到东安去邀请唐，随后省会群众团体又派代表陈云章等去东安迎唐。四月下旬，唐应邀来到长沙，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程潜也率军政官员到车站迎接，并举行欢迎宴会。唐在欢迎宴会上即席发表谈话：“为团结湖南人民，保卫湖南的安全，愿与天下人为朋友。我此次来长沙，是替湖南三千万人民服务的。”随即发起组织“湖南人民自救会”，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自保自救。这个组织的成立，实际上是要使湖南脱离南京政府，走和平解放的道路。表面上没有提出“和平”的口号，也没有明显赞成中共的主张，那是为了避免蒋介石和白崇禧的打击。唐到长沙后，找陈采夫谈了“湖南人民自救会”和他的打算，陈采夫也向唐介绍了“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的情况。事后，陈采夫来问我，是以“促进社”的名义与唐联系，还是以个人名义与唐联系，何者为好？我当即告诉他说，唐生智是高级将领，你不必要求他参加“促进社”，可以诚恳地向他表示：“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支持他的“湖南人民自

救会”。“自救会”是团结全省人民自保自救的组织，“促进社”只是联系一部分进步军人，两者的目标相同，都是为了求得湖南的和平解放，也可以说“促进社”就是“自救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唐下面的人，象唐生明、李觉等，和他们接洽时也可作同样的表示。希望他们与程潜密切配合，谋求湖南的和平解放。陈采夫按照这个意见办了。“促进社”在支持唐生智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些情况我都先后向省工委汇报了。当时程潜与唐生智之间，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的。唐曾向程潜提出要安排一些县长、专员、司令在湘中、湘南搞地方武装，控制湘桂、湘粤交通线，截断白崇禧回窜广西的退路，程都一一照办了。唐的这些行动也有力地支持了程潜。“自救会”一时搞得声势很大，并打算建立常设机构。白崇禧窜到长沙后，把“自救会”视为他推行反动政策的障碍，立即下令解散。为了安全，唐与李觉连夜离开长沙，避到邵阳。唐到邵阳后，又积极宣传湖南人民团结自救。当由县参议会，警备司令部发出通知，邀集地方士绅及群众团体、工商界数百人在县参议会礼堂开会。唐非常激动地发表讲话，历数蒋介石发动内战残害人民的种种罪恶，号召全省人民起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在会上有从武汉大学回邵阳的李剑农教授，县参议会议长赵恒和蔡锷旧部雷飙等十余人发了言。他们讲话时，都是激昂慷慨，反对战争，拥护和平。当时邵阳的情况是一方面反动势力气焰嚣张，另一方面和平声势迅速高涨。唐生智的这次讲话，对邵阳的和平力量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唐去邵阳的第三天 我也到了邵阳，在李剑农那里秘密地会见了唐。我说，目前时局极度紧张，白崇禧已是日暮途穷，不可能在长沙呆多久，邵阳情况很复杂，孟公在此地不可久留，最好立即回东安去，迅速组织武装力量，以便届时截击白匪军。他同意我的意见，表示

回东安后，将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人民武装上面。我在邵阳停了一天即回长沙，随后唐就回东安去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下旬，省工委命我由邵阳去东安与唐联系，并派湖大学生、地下党员张华联(后改名张凡)同行。由邵阳到东安约一百三十多华里，那时没有公路，只有乡村小路。时间紧迫，必须一天赶到，迟了恐误大事。我与张穿着草鞋，拿着雨伞，早上六时出城(早了非有特别口令不能出城)，路上没有时间打中伙，肚子饿了，在过路亭子里买两个铜板的稀饭，站着喝了又继续走。一直走到晚上八时半左右，在倾盆大雨中到达唐家。张华联没有走路的锻炼，第二天上午才赶到。我们到唐家以后，与唐会谈了两天。首先讲了“自救会”被白崇禧解散后，在省工委领导下，长沙群众要求和平的呼声更加高涨，自救运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得到更大的发展。接着，讲了解放军进军形势，先头部队已进入湖南，分东、西两路向南推进。程潜即将由邵阳赶回长沙，准备发表起义通电。白崇禧的部队集中在衡宝线上。希望他作好准备，免被白的特务暗算。还传达了省工委的意见，希望他执行五月在邵阳与我商定的计划，组织地方武装，切断湘桂线，阻止白匪军窜回广西，以便解放军到湘南时，把白的主力消灭在这一地区。他表示完全同意，并谈到他在东安临近各县已组织了一些武装，目前正在东安、邵阳、武冈一带活动，与湘中二支队莫新春部也有联系。他自己还有点枪，可组织一支武装。另外，他能指挥的还有一个保安团。我即把省工委交给我带去的张华联留在他处，要他给以秘书名义，或安排在他办的耀祥中学当个挂名教师，好与吴立民一道帮助工作。吴立民原是唐的秘书，跟随唐多年，思想进步，对唐有一定影响，后来张华联吸收他参加了党。我刚离开东安，白崇禧就派人请唐生智出来与他合作，或去广东担任考